

● 卢 现 祥

简析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增长中的若干问题

一、如何看待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

改革以来，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一直呈上升趋势。有人计算过，我国城乡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一五”时期为0.0439，其中城镇为0.0394；而在1979年以来的近8年内，城乡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上升为0.1468，其中城镇为0.2314，农村也达到0.0830。^①到1988年底，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总额达6106亿元，其中储蓄存款3919亿元，现金1737亿元，有价证券486亿元，保险金54.6亿元。目前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已达7千亿元。决策部门和理论界对此喜忧参半，褒贬不一。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居民结余购买力。现在有文章论述“如何处置7千亿元居民结余购买力”。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因为7千亿元中的有价证券、保险金等是不需要“处置”的。因此，对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分析，不仅要注重其总量，还要分析其结构。所谓居民结余购买力，从居民消费的角度看，是收入大于购买的余额，但从总量上来观察，它是储蓄的组成部分，其对应的产品和服务基本上被投资所使用，构成资本形成的等量部分。居民得到的是现金、存款等金融资产和一部分个人所有的固定资产。

其次，对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既要把它与经济体制改革联系起来，也要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要注意其现期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也要分析其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构造的关系。我认为，当前我国理论界不少同志对居民结余购买力增长的负效应分析较多，而忽视了其正效应。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增长的正效应主要表现在：

(1) 它确立了消费者主权的地位。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使居民的选择能力增强，选择的范围扩大，这迫使企业不得不改变传统的经营思想。当前的市场疲软，其根源在于最终需求不足，它迫使我们的政府决策者和企业经营者不得不重新考虑消费者的地位。

(2) 它为废除资金供给制提供了前提条件。我国传统体制下的“父爱主义”及其国家对企业的“大锅饭”式的资金供给制根源于国家的统收统支和政府储蓄比例过大。在我国近10年的改革过程中，总储蓄的部门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见表）。

从这个部门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政府维持资金供给制愈来愈困难，企业低效使用资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目前，银行亏损面的增大是我国废除资金供给制的告急信号。

(3) 它有利于我国资金市场的建立和银行体制的改革。资金市场的发育和成长，有待于社会闲置货币资金的增长。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无疑给我国资金市场的发展拓展了空间和注入了新的血液。作为硬预算约束的居民家庭，对价格的敏感反应，对消费与储蓄的决策以及对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需求和对未来的预期，能给我国银行金融体制的改革以强有力的

压力。

总储蓄的部门结构

单位：%

结构	年份	1979	1981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总 储 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居 民 储 蓄		24.40	32.03	44.75	50.58	50.02	59.53	61.15	62.70	65.91
政 府 储 蓄		31.82	26.11	24.05	24.11	24.33	22.20	16.38	11.12	
企 业 储 蓄		43.78	41.86	31.20	25.31	25.65	18.27	22.47	26.18	34.09

资料来源：《经济研究》1990年第4期。

(4) 它为我国进一步改革提供了选择的空问。就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角度看，储蓄主体和积累主体的多元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趋势。同时，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还为我国住房商品化、福利制度的改革、股份制的推行、拍卖一些无效率的中小型企业、价格的改革等提供了经济社会基础。

二、居民结余购买力是否“没有物资保证的虚假资金”

有人认为，我国储蓄持续大幅度虚假增长，部分储蓄形成没有物资保证的虚假资金。由于货币购买力的增长大大超过了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所能增加供给的可能，结余货币购买力大幅度增加，近几年中居民新增加的货币收入中约有70%不能转变为现实的消费而逐年沉淀下来，转化为储蓄，必使我国的储蓄也没有相应的物资商品作保证。储蓄总额所代表的商品购买力，相当一部分属于虚假，如果通过银行贷款，将这部分虚假购买力转化为投资或流动资金，便形成了虚拟资本^②。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认为我国近几年中居民新增加的货币收入中约有70%不能转变为现实的消费而逐年沉淀下来是没有根据的。这种分析是简单地把居民收入与消费基金等同，把居民金融资产与对消费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等同。第二，从工资的增长情况看，1978—1988年10年期间，职工实际工资总额增长了1.16倍，年增长8%；同期，国民收入增长1.42倍，年均增长9.2%，二者比例关系为1:0.87。在这期间，职工实际平均工资的增长也没有超过同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前者为4.2%，后者为7.8%，二者的比例为1:0.54。第三，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是改革以来放权让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我国居民储蓄从绝对水平看，1989年是3714亿元，比1979年的296亿元增长了11.5倍，而且同期的居民消费增长了3.5倍，从相对水平看，居民储蓄1979年占全部储蓄的不到1/4，1989年占近2/3。占GNP的比重从6.8%上升为19.7%。原来以政府和企业为储蓄主体（1979年为75.6%），现在则以居民为储蓄主体（1989年为65.9%）。原来的政府和企业储蓄之和为居民储蓄的3倍多，现在则是居民储蓄的一半略多一点。显然，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是以政府和企业对“经济剩余”占有的减少为前提的。它并不与物资商品的多少发生关系。这是一种价值分配中此消彼长的关系。

三、银行是否完全应将个人储蓄（或结余购买力）转化为生产资金

近几年，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对我国经济运行、市场波动的影响愈来愈显著。如

市场抢购和市场疲软的交替、储蓄的高流动性、消费型储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吸收储蓄的经济社会成本上升和企业对高负债经营的承受能力低等已经引起我国决策部门和理论界的重视。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一些人把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视为“笼中虎”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此外，资金短缺将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由此，不少人提出银行应将个人储蓄转化为生产资金。现在一谈到个人储蓄或结余购买力，好象只有把储蓄转化为生产资金才是正确的或唯一的，殊不知，这种观念的危害是后患无穷的。

首先，就我国银行自身情况看，根据1987年全国信贷收支平衡表，银行长期贷款仅占贷款总额的14.2%。这说明银行将储蓄存款转化为投资的能力还十分有限。日本国民储蓄也大部分通过银行进行，但是日本经营储蓄业务的投资却将大约80%左右的资金投入长期信贷业务中，直接形成投资。尤其重要的是，银行将个人储蓄转化为生产资金还会影响社会总需求，特别是最终需求。日本与我国不同的是，日本在二次大战后，基本采取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因此，个人高的储蓄率对最终需求影响不大。而我国外贸（尤其是出口）占GNP的比例不大。所以，提高储蓄率将会影响最终需求。最终需求不足将会引起市场疲软，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据统计，我国1989年1—9月份银行商品性回笼比上年同期增加392亿元，增长7.6%；而同期信用回笼货币1215亿元，增长39.6%，占回笼货币总额的62%。信用回笼货币大大超过商品性回笼货币是导致我国市场疲软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我国居民的储蓄基本上是一种消费型储蓄。这种储蓄存款是不稳定的。即使银行有把这种消费型储蓄转变为长期投资的欲望，但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尤其在我国是一个短缺经济和企业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这种风险就更大。以武汉市为例，在1986年至1989年上半年近4个年份中，储蓄资金成本均大大高于综合资金成本，其中有两个年份高出1倍以上。如把储蓄资金成本与全部资金收益率进行比较，在4个年份中，除了1986年有轻微盈利之外，其他年份均为亏损。

最后，把个人储蓄仅仅转化为生产资金观念使我国住房商品化等改革根本无法进行，并把银行的职能单一化。长期累积的结果是使我国居民储蓄成为一色的“食利阶层”。我认为，银行应该开展消费信用业务，如购买商品住房信贷等。发展消费信用，既有利于消除当前的市场疲软，也有利于一些改革措施的推进。发展消费信用与鼓励高消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例如，让企业向银行贷款建职工住房与让消费者申请银行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对我国深化改革，尤其是拓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转换途径，效果是不同的。

四、个人能否作为“三分之一的积累主体”

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使我国的积累主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国际积累主体格局的比较（%）

	中国 (1981)	美国	英国	日本	南朝鲜	印度
政府积累	49	7	0	9	26	13
企业积累	22	58	56	37	35	22
家庭积累	29	35	43	54	38	6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19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有人认为,“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双重角度看,在一定的时期内,‘三三制’(即政府、企业、个人的积累各占1/3)也许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积累主体格局。”^③值得思考的是,在一定时期内,我国个人能否作为三分之一的积累主体?个人储蓄或结余购买力能否转化为积累和投资,关键取决于一国的产权制度。笔者认为,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增长中的矛盾,从长远和深层次的角度看,表现为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与居民生产性(或资本)积累动机微弱的矛盾。尽管这个矛盾目前还不很明显,但趋势是令人担忧的:

(1)就整个国民经济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的比例看,我国年均生产性积累,1958—1977年间为22.4%,1978—1987年间为19.1%,后者比前者低3.3个百分点。我国国有企业1987年比1986年,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增长17%,生产用固定资产增长12%。与其他国家相比,1986年我国居民消费性金融资产与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比例为59:41,高于同期的日本(9.8:90.2)、美国(8.5:91.5)、联邦德国(26.6:73.4)。

(2)从个人储蓄动机和储蓄结构看,据调查,在居民的选择中,为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的占22.1%,为供养子女或赡养老人占31.1%,为家庭成员婚丧嫁娶之需占31.0%。^④这与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居民的储蓄动机相比,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一般说,西方国家居民的储蓄中,资本性储蓄、遗产性储蓄,特别是退休保险性储蓄通常占极高的比重。

(3)农民生产性积累动机微弱。1979—198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平均速度为15.5%,同期,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平均速度为15.1%(《中国统计年鉴(1987)》)。农村改革不仅把土地的经营权交给了农民,而且农民还应承担经营土地的长期责任,所以在它们增长的收入中实际上包含着原来由集体集中的那部分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但是,“超前消费”、建房热等近些年在农村蔓延。据统计,全国农民人均住房面积已从1979年的8.1平方米增长到1986年的15.29平方米,增长88.7%,每间房屋的平均价值也由1980年的269.17元,增加到1985年的465.75元,增长了73%。1986年,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量中自行车90.31辆,比上年增加9.67辆,电视机17.28台,比上年增加5.54台。农民生活性消费如此快增长,与我国农民目前的生产和收入水平是不大相当的。农村大量水利设施建设等被人遗忘。据统计,1986年农民用于家庭经营生产的投资额人均均为149.31元,比上年增加9.22元,仅增长6.6%,大大低于生活消费的增长速度。在总支出中生产性投入所占的比重比上年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而生活消费支出则提高了1.2个百分点。生产性投入增长在连续几年农民生活已有所改善而生产急需投入的情况下放慢,不能不是一个应当引起我们密切关注的问题。此外,目前市场货币存量的70%在农村,大量货币分散地滞留在农民手中。

透过上述诸种现象,笔者认为,第一,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与生产性(资本)积累动机微弱的矛盾根源于我国现有的产权制度。因此,在我国既有产权制度下,城乡居民很难作为我国三分之一的积累主体。第二,在近几年的我国放权让利、国民收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我们都忽视了个人收入增长后,新的积累主体格局的构造问题,忽视了既有的体制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承受能力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过程中应该解决的一个理论与实际问题。

注:①吴敬琏主编:《1986年中国经济实况分析》1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②高天鹏:《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负效应分析及对策》,载《金融研究》1990年第5期。

③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第7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④《向新的高度跃升—万户城乡居民消费、储蓄意向调查》,载《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9期。